

鲁迅研究
新前沿丛书



陈漱渝
* 主编



犁与剑

——鲁迅文体与思想再认识

李林荣——著

◆ 漓江出版社



犁与剑

——鲁迅文体与思想再认识

李林荣——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犁与剑: 鲁迅文体与思想再认识 / 李林荣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07-7099-0

I. ①犁… II. ①李… III. ①鲁迅小说—小说研究 ②鲁迅杂文—文学研究 IV. ①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5171 号

犁与剑: 鲁迅文体与思想再认识

作 者 李林荣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王楠 付博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7-7099-0
定 价 36.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鲁迅研究新前沿丛书》缘起

陈漱渝

在信息科学领域，被称为新前沿的有新型计算机系统、高效信息储存、极限通信传输、超级芯片等。在鲁迅研究领域，何谓“新前沿”？

如果从1909年5月出现了第一篇介绍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域外报道算起，鲁迅研究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鲁迅生平史料可以说已挖掘殆尽。对鲁迅文本的解读虽然一度有单一化的弊病，但在总体把握上也可以说基本正确。要继续拓展鲁迅研究的学术空间，实可谓难矣！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从个体精神心理、文化诗学、叙事方式、文体演进等不同视角切入鲁迅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把鲁迅世俗化、玄学化等不良倾向。无论在国内，抑或国外，鲁迅研究实际上已呈现低迷的态势。

然而在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甚嚣尘上的当下，仍有一些老、中、青的鲁迅研究者传递着鲁迅经典的精神火炬。他们深知，鲁迅经典不仅在中国新文化构建过程中发生过摧枯拉朽的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鲁迅文本进行重读和重释，使其蕴含的跨越时空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以回应当今文化建设中面临的迫切问题。这就是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动因。

不过，鲁迅研究领域的“新”与“旧”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新”不完全意味着正确，“旧”不完全意味着谬误，而是彼此交织，交相辉映。从这个意识上说，我们期待的“新”绝不是对前贤研究成果的颠覆，而是一种超越和拓展，实质上是希望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愈益完善。

这套丛书的作者包括了鲁研界老、中、青三代学者，又包括了专业和业余的研究者。他们的成果是对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新进展的一次检阅。丛书中对鲁迅科学思维方式的系统研究，对鲁迅小说、杂文文体形态和文化渊源的深入研究，以及运

用医学、民俗学、书法鉴赏、文物收藏等多方面的知识，对鲁迅丰厚文化遗产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无疑是鲁迅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丛书中还有不少扎实的考证文章，对澄清历史事实，恢复鲁迅的本真面貌大有裨益，为提升“鲁迅学”的学科水准铺垫了雄厚的基石。

2014年5月

前言

把这本通过解读鲁迅的部分小说、杂文及与之相关的书信、译作，来探究鲁迅思想与文体变迁脉络的小书，命名为《犁与剑》，反映着我在鲁迅研究领域一路跋涉至今，感触日深的一点新体会。鲁迅有理由被同时誉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作品也有理由被形容成匕首和投枪。但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和生活过的鲁迅，首先只是一个文人，而且终究只是一个文人。

在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确实一直有在当时和后来都可毫不过分地称之为“伟大”的思想运动和革命运动，也有实际效果真的不亚于匕首和投枪的文字形式，但鲁迅本人和鲁迅的写作，并不属于此列。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客观条件所限的“未能”，或者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主观上的“不愿”，总之，鲁迅人生道路上最主要也最精彩的部分，是笔墨的耕耘和精神的抗争，而不是别的。

对此，如果非要形诸物象，那么，可能质朴的“犁”与雅致的“剑”，比寸铁杀人的匕首和一击而制敌于死命的投枪，要更恰切一些吧。虽然鲁迅确曾写过赞颂手持投枪的战士形象的篇章，也留下了希望战斗的小品文能够如匕首、如投枪的话，但纵观鲁迅生前身后，他为人为文的切实影响，终于还是落在了对汉语现代写作和中国现代人格这双重世界的开拓和反思这两个相对“务虚”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在相互支撑和相互转化之中的，不是机械割裂的。这也正如犁与剑，形态和功用迥异，质地却属一样。铸剑为犁或反过来铸犁为剑，实为一种性质的劳动，具体当如何，在铸造者这里，完全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上述这点体会，毫无疑问，并不新颖，更不高明。依着它，鲁迅和鲁迅的作品似乎显得低调、朴素了很多。我并没有多大把握，确信自己今后也一直会这么看待和理解鲁迅和鲁迅的作品。但现在，这就是我的鲁迅观和鲁迅作品观。或者换句话说，在鲁迅和鲁迅作品研究的长征中，现在我正好走到了这一点。下面，且对我抵达这一点之前的经历和从这一点上准备再出发的想法，做个简略的报告，以求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从1996年撰写、发表解读《阿Q正传》的那篇一万六千字的论文习作《文化断带上的游魂》算起，到今年秋天，我涉足鲁迅研究整整17年了。这已接近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白话文学写作生涯的全部时长。但在了解、认识和研究鲁迅方面，过去这17年，对我来说，至多只是经历了登堂入室前后的几步胡乱摸索。这17年里，除了中间有22个月，我一度以鲁迅研究为本业。其他时候，包括现在，鲁迅研究都不属于我本职工作范畴内的必需项目。这或许是个欠缺或者遗憾。不过，正在这种有所欠缺、有所遗憾的处境中，我得以逐渐体会到了一种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来自鲁迅本身的魅力，也逐渐养成了一种通过反复阅读鲁迅各类作品，来重新发现鲁迅和重新看待世界的习惯。

与许多前辈一样，我最初闯进鲁迅研究领域，不仅偶然，而且懵懂，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觉悟，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模仿和追随。所模仿和追随者，当然不是那会儿即便在文坛和学界的很多角落，都已经走得很远很远的鲁迅本人，而是近在身边的鲁迅研究名家：为我们连开几门课的王富仁老师、时时出现在讲座和答辩会上的钱理群老师。听其言、观其人、读其书、省其思，我深受感染。这感染给我增添了一点很宝贵的定力和信心，使我在当时重又汹涌澎湃起来的西方理论大潮的冲击和包围下，多少找回了些身为中国文人的自尊。今天再看，王老师和钱老师他们，在鲁迅研究史上，其实仍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一代。贯穿在他们的表达和思考中的那种沧桑感、沉重感和宏阔感，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了最好的形式和效果，用不着也不可能由谁来模仿和追随。

意识到这一层，是在我自己尝试写鲁迅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但不能随心所欲地模仿和追随，而且对鲁迅和鲁迅作品本身的困惑所在和兴趣所向，也无法叠合进自己想要模仿和追随的几位老师们惯用的论述框架内。在那样的论述框架里，鲁迅的伟大和崇高，已毋庸置疑、无须求证，要推究、勘定的，是鲁迅具体在怎样的意义或维度上成就了他的伟大和崇高。而对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鲁迅其人其文的伟大和崇高，还是一个必须靠我们自己并且用我们自己信得过的方法来重新验证的命题。成长的经验和习得的知识，迫使我们非如此则不能接受或者继承从前代而来的鲁迅观。

1997年，我离开鲁迅生活过14年的北京，来到鲁迅文学生涯最后10年的历史现场所在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这年秋冬，我平生头一次一字不落地逐卷细读了《鲁迅全集》，并且做了系统的笔记。这一时期，我未能在自己的专业方向当代文学之外，再听到鲁迅研究的专题课和专门讲座，却有幸多次蒙王晓明老师召唤，到丽娃河畔的华师大文科楼中文系和巨鹿路的作协小洋楼底层会议室，参加主题非关鲁迅、气氛却颇似我想象中的鲁迅时代的文青聚会的研讨。在这种场合，晓明老师竭力启发并且殷切期待年轻朋友们积极发言的神情，每每使我想起北京《鲁迅研究月

刊》编辑部烟雾缭绕之中的王世家先生。

身为历史人物的鲁迅，如果还确实不曾被岁月的流沙所淹没，那么，一定是我们眼前的现实世界里还存留着一片空间，需要和他极其相似的某种文思风范、为人做派和精神气质来释放光亮、播撒温暖。借着这不期而至的光亮和温暖，我在上海写出了自己的第二篇鲁迅研究习作、两万八千字的《〈狂人日记〉与中国现代人格的生成》，也开始关注王元化先生从反思“意图伦理”的角度重审五四、张灏先生对五四思潮的两歧取向予以剖析等鲁迅研究的周边学术动态。鹿鸣书店新上架的两本书，乐黛云先生主编的《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和李欧梵著、尹慧珉译的《铁屋中的呐喊》，也被我买来细读再三。从这些阅读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不同于我此前认识的新的鲁迅形象。他不再耸立于单纯仰望的视域中，因此也不再显得那么巍峨、轩昂。但他在一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等位对观的新的感知视角下，焕发出了比刻板僵硬的巍峨、轩昂，比辉煌庄严的伟大、崇高，都亲切得多、生动得多，也可信得多的活力和激情。

2000年，我自复旦大学毕业重返北师大从事博士后研究，终于得到机会，第一次把自己的专业思考和写作聚焦于鲁迅研究。在王富仁老师的鼓励下，我选定了鲁迅杂文的课题。这时，鲁迅杂文已经比鲁迅小说让我更感疑惑和更急于一探究竟。杂文不是鲁迅的全部，但不理解鲁迅的杂文，也就谈不上理解鲁迅。而要理解鲁迅杂文，重要的是把握它完整的肌体和脉络，绝不能止于搜寻片言只字或紧盯一鳞半爪。两年时光，匆促飞去，刚够我这准备一网打尽、涸泽而渔的鲁迅杂文研究铺开场地、摆下阵势。第一阶段历时性的鲁迅杂文细读，帮助我依稀辨识出了鲁迅从留日时期到新青年时期，再到五四、女师大风潮、五卅和三一八时期，面向人生、社会和文学的多重困扰和多重追求，思想、情感和文体上发生的一连串复杂变化的重要印记。

为把这些心得充实、完善成可供学界同好共同切磋的严整形式，我费了好几年工夫，陆续整理发表了约十万字的系列论文，但总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或者说力有不及。直到两年多前，我才下决心把注意力向鲁迅后期的杂文和杂文以外的其他各类写作转移。虽是转移，此后我读写思考的重心，实际还是落在了之前研究的遗留问题和相关知识空白上，比如鲁迅辑校古籍、鲁迅留日期间的文言译作、鲁迅书信、鲁迅译文序跋、鲁迅著作和译述中的域外因素。这都是我以往不很熟悉的领域。所幸的是，张梦阳、赵京华、李冬木、张钊贻等老师的一系列著作和不经意中的指点，给了我雪中送炭似的帮助和支持。近一两年来，我写的几篇有关《伤逝》《朝花夕拾》以及鲁迅后期杂文与鲁迅和尼采的论文，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些初步的收获。

就在这效率低得每每自顾之下不免深深惭愧的磨洋工式的劳作中，跨过“四十而不惑”之年的我，却常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鲁迅研究，是否已在一不留神之

际走了没出息的“老路”或者剑走偏锋的“邪路”。假若鲁迅在天有灵，甚望他老能为我这小小的研究，做个正道直行的指引和见证。可有时转念想想，我这自我怀疑八成也是多余。在当今这个鲁迅生前担心过的一切有可能“谬托知己”的鲁迅同时代人早已凋零殆尽的、真正的后鲁迅时代，和鲁迅对话、拿着鲁迅说事，不早已成了一种公共的话语权利了吗？在这样的年代，对我们这些读熟了《鲁迅全集》和鲁迅史料的人来说，坚守住自己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学术品质底线，不跟风，不起哄，不为形形色色的消费鲁迅的八卦和花边站脚助威，更不从中捞油水，只为自己认得准、信得过、靠得住的鲁迅说话，兴许这就是一条对得起鲁迅，也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读者的堂堂正正之道。

目 录

《鲁迅研究新前沿丛书》缘起	陈漱渝 (1)
前 言	(1)

上 编 鲁迅小说的文体与思想

中国现代人格的生成与祛魅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狂人日记》	(2)
-------------------------	-----

文化乡愁与精神怀旧的小叙事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一件小事》与《故乡》	(29)
------------------------------	------

放逐在文化断带上的游魂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阿 Q 正传》	(36)
---------------------------	------

现代知识分子认同危机的镜与像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孤独者》	(52)
------------------------	------

复调变奏与情知悖论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伤逝》(上)	(77)
--------------------------	------

情爱悲剧,主义哀歌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伤逝》(下)	(90)
--------------------------	------

下 编 鲁迅杂文的文体与思想

递变“传统”与创制“现代”

——文体史与思想史视域中的鲁迅杂文(上)	(108)
----------------------------	-------

重辨公私范畴与战斗性修辞

——文体史与思想史视域中的鲁迅杂文(下) (126)

度越“五四”的表里冲突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鲁迅杂文(上) (137)

步入战阵的多重转折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鲁迅杂文(下) (152)

鲁迅“尼采”的踪迹及意蕴

——文体和思想比较研究视域中的鲁迅杂文 (168)

后 记 (189)

上 编

鲁迅小说的文体与思想

中国现代人格的生成与祛魅

——文体与思想视域中的《狂人日记》

在本初意义上，一切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人类言说范畴里的同一种类。与别种言说形态不同，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一次性地展开于相对确定的说者和听者的关系中，而是随着这种听说关系的变化逐步明朗逐步丰富。我国社会文化构型近百年间的反复激变，使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极具时代风采的作品在意义显明的途路上最终褪尽了光华，露出虚妄的面目。自然，这也是一种意义的丰富。但它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设只能起到销蚀的作用。换言之，这类作品尽管具有新文学的外貌，在本质上却是反现代的。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才能感受到鲁迅作品“忧愤深广”的精神标高。在今天，奉鲁迅作品为“不朽”的人未免有些矫情。然而，透过鲁迅的作品，但凡对中国社会文化怀有真诚的盼望和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可以看到一个不仅关切着现实，而且瞩望着未来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鲁迅的作品不仅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写的，也是为今天以至此后更遥远的时代写的。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以为就没有认识中国的现在和过去。



鲁迅整个作品系统背后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并不等同于他任何一篇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作品中的人物只是鲁迅展示这个现代中国人形象与我们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可以通约的那些方面的一个中介性符码。因此，这些人物往往具有两重意向：一方面，他们具有我们感到陌生的性格、情绪和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迁就着我们的思想习惯。在这样一些中介性符码中，“狂人”是非常独异的一个。他在上述两个方面均有极端化的表现。以往的研究大多只看重前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开掘出反封建反传统等社会意义，同时对后一个方面却较少注意。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自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

教的弊害”，这是理解《狂人日记》的重要提示。不过，作为读者，尤其是研究者，简单地把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内部人物形象的意义等同起来，是远远不够的。假若《狂人日记》的全部意义仅仅被归结到揭示封建传统吃人本质这一层面，那么，我认为，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价值就大大地遭到了折损。

新近的研究表明，早在清末，中国知识界反封建传统的思想言论即已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①。鲁迅是亲身经验了这一思潮并且穿越了这一思潮及随后的政治革命行动的限界来到《狂人日记》所标示的精神高度的。他借着《狂人日记》暴露的弊害已经明确地指向了单个的“人”。这个“人”的社会阶级背景含糊，他的周围没有凶相毕露、气焰逼人的权贵，他自己的生存状况也没有落到悲惨凄苦的绝地。在通篇小说中，这个“人”仿佛只是惶恐地奔逃于一条极其狭窄的单向度的意绪道路。这种情态使得他不像一个丰满生动的，生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人。有的论者从象征的角度分析这个形象，有的论者还乐于结合精神病理学的知识解读这个“人”的种种怪异感受。这些是必要的。但这样两种处置并不能整合“狂人”作为一个人物形象的单薄和《狂人日记》作为一个完整语篇的流畅自足。

只有在人格层面上，《狂人日记》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理解。具体而言，“狂人”是作为鲁迅思想里中国现代人格的代码出现的。他并不主要负载某一确定的社会阶层成员所带有的各种具体特征和现实意义，也决非简单地设置在小说里转达作者呐喊的一个替身或传声筒。他积聚了鲁迅对于现代人格在中国萌发并且争取成长的可能情境的思虑。既如此，“狂人”作为一个形象，就不能不是单薄的：一方面，他必须表现新人格初生状态的脆弱和幼小；另一方面，他必须尽可能地舍弃各种旧的普遍性的人格特征，才能凸显自身的新。而《狂人日记》，则应当视作对中国现代人格生成的可能情境的一次讲述。我不能同意那种把《狂人日记》的全部或局部当成病历进行解释的做法。精神的正常与错乱，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或分裂程度，一方被公认为错乱，是以另一方被公认为正常做前提的。^②如果把《狂人日记》视作病历，我们其实就站到了“大哥”“赵贵翁”“陈老五”之流的立场上，而这只能使我们面对《狂人日记》更加茫然无知。

事实上，《狂人日记》是一个完全自足自持的语篇。在其背后，隐含有一个健全而绝无病态的中国现代人格形象。前已述及，“狂人”一方面令我们觉得陌生，一方面又迁就着我们的习惯。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他的意义中介地位决定的。“狂人”不是成熟的中国现代人格，他只是在传统基质上展示新人格某些标识性特征的代码。脱

① 参阅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第117—130页。

② 参阅〔英〕R. D. 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林和生、侯东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19—27页。

离开社会文化整体架构的重建，并不真的存在孤立自为的新人格生成。小说开端以文言形式设置了一段题记，其中交代，“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去了。这不仅仅喻示着先觉者无路可走的遭际。从鲁迅的整个人生和见于别处的言论来看，他自己既然不妥协于这种遭际，也不曾把发现这种遭际当作一个多么要紧的消息。

“狂人”的候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消解“狂人”所代表的新人格自我完成的可能性。它暗指着中国人在现代境遇中为重铸人格必然行走的现实途径。踏上这条路，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投降。只有从起点到终点的生命全程，而不单是起点、终点或中间某点，才能作为人格判断的依据。^①《狂人日记》对此仅给出了很模糊的隐喻，但这种隐喻的指向是确定的。小说正文十三节白话讲述，在语义结构上，整个地为文言题记所包嵌。这不是随意或从俗的安排，这种构设本身就映现着“狂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狂人”由于负载了新人格特质而不能不蒙受这种背景的排斥和挤压，同时，陈旧的传统人格基质又使“狂人”自己也充当着这种背景的一个元素。内外两面的深刻冲突决定了现代人格在传统文化架构内部出生后非经由个我分裂阶段不能成长的前途。

具体地说，个我分裂就是心与身的分裂。唯有积极主动地实行这一分裂，人才可能保守自体内部新人格孕生、发展的契机。^②《狂人日记》利用时空链把一个人身心两方面的生活剥离开来，分别铺排在病中和愈后两个区位里，并且，集中笔墨呈现了以“病状”表征的心的生活。我认为，这种构设正是《呐喊》的总体艺术追求——“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③——在《狂人日记》中最突出的显示。^④

-
- ① 假使《狂人日记》确是某个真人某一时期思想行为的写照，那么，支撑这些思想行为的精神结构既不可能形成于一旦，也就绝不可能因为病愈而猝然塌陷。凭什么理由可以认定“赴某地候补”的“狂人”已经弃绝了他先前的思想行为倾向呢？事实上只有根据一个较长时期的生活过程，才能做出这种判断。因为毕竟当时的现实并不能在“候补”之类的道路以外，提供给“狂人”一种形式全新的活法。
- ② 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揭示。“吕纬甫”指示着耽于维持心身合一而不得不牺牲新人格生成可能性的人生路向。在新的社会文化整体架构未出现之前，心身合一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重新退回旧人格状态。退回造成的新质残留必使“吕纬甫”们在狰狞的清醒里饱尝痛苦。“魏连受”则指示着为保全精神而殉身的人生路向。选择这一路向，个人的生命即舍作献祭。但这种选择实质上是指着希望的。
- ③ 语出自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 ④ 在传统文化架构内部，经常发生着一种消极性的身心分裂。它的特征是：让精神的活力牺牲于物质的安逸，让心的生活俯就于身的要求。“阿Q”型类群的人格取向即体现着消极性身心分裂的特征。而现代人格的基本特征可以相对着表述为：以心的生活统驭身的生活，以物质发展维护精神的自由。不把心的生活作为着力讲述的对象，不着力展示“狂人”的心的生活，身心分裂在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内截然不同的表现就不能得到显示。

二

所谓心与身的分裂，是相对身心浑融而言的。正如黑格尔所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精神历史序列中处于幼年形态^①。在这种文化圈层内部，除了与君权相结合的“唯一的个人”之外，“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②。更确切地说，这种带有童蒙特征的精神现象，就是身心浑融：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意识感受到自己身体的价值，自己的身体也无须自己独立意识的支配。简言之，这种生存方式根本不要求心与身的二分。然而，设若不打破身心浑融的限界，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跃迁就绝无可能。

《狂人日记》以这样奇异的讲述开始展现一个中国人从身心浑融走向身心分裂的过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在这里，“三十多年”约指“狂人”的年龄。“月光”，实际上是一个参照。凭着它，讲述者——心——得以确证并且表达自己与被讲述者——身——分裂的事实。^③这种分裂，从讲述者（心）单方面来讲，意味着新生；从讲述者和被讲述者双方面（即心身两面）来讲，则意味着“狂人”这个完整的个体生命内部实现了人格的再生。新生的心彻底否定了过去三十多年身心浑融的生活：“全是发昏。”如此决绝的意态并不是夸张，它反映了“狂人”心身分裂后企望自主自由的现代人格的强烈倾向，而这倾向在本质上与身心浑融的传统人格是丝毫不能通融的。

然而，当面对自我以外的现实处境时，“狂人”不得不抑制自己人格再生的“爽快”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提示自己“须十分小心”。这有两层意指，第一是针对“狂人”自体内部存留的传统人格基质，第二则是针对“狂人”周围各种可能扼杀新人格萌芽的传统势力。其中，第二层意指是主要的。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这句话看似突兀，实际上，沿着上述

① 参阅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53—266页。

② 转引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同前，第258页。

③ 从词源学及巫术或传统医学观念的角度讲，“月亮”在西方文化圈内原本即具有与“癫狂”紧密相关的语义联系。如在英语中，“lunatic”（癫狂的，疯子）等词即以“lunar”（月亮的）为字根，而由“moon”（月亮）与“struck”（撞击）合成的“moonstruck”一词，则意为“精神错乱”。而西方近代精神心理学说中，也有将月之盈亏认定为人情绪涨落节律的重要诱因的观点。

第二层意指的路向去感受，就会发现，它是顺延着语义流自然跃出的。这里不存在语义上的中断。“赵家的狗”，是一个符号，它兼有非我和凶恶两重意思，代表了“我”所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外部危险。^①正是因为对这么一种危险存在的觉察，“狂人”的心情从不安骤然堕入了恐惧。“我怕得有理。”这是“狂人”动用理智对恐惧进行的确认。

小说第一节至关重要。它清晰地界划出“狂人”在整篇作品里情感活动的上下限。^②“狂人”的轻松、自信、欣悦，以及惊悚、不安、恐惧，连同引发这些心态的原因，和这些心态所指的对象，或隐或现，全都汇聚于此。所有这一切，并不是随便堆垒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内核有序地牵连成一个情知意三维立体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狂人”的精神结构，也即中国现代人格的初生状态。它的内核，就是恐惧。如果承认现代人格只有在文化相对主义范畴才能找到确定的内涵，那么，对于中国的现代人格，在情感维度上，只有当它以彻底的恐惧作为标识，才能与别国——尤其是那些安然自然地先于中国进入各自的现代文明阶段，而后却以野蛮时代的方式掠夺性地全面侵略并且残害过中国文化的东西方强国——的现代人格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那些在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的讨论中特别重视近代历史强加给中国的被动处境的观点。例如，已有研究者开始用“被现代化”或“被近代化”的提法指称近百余年中国有异于别国的文化行程。不过，如果脱离开主观情感维度，单纯强调客观态势的被动性，我以为并不能使分析潜入问题内部——若仅止于此，所谓文化研究就只能蜕变为问题表象层上的智力滑行表演。宏观文化形态的各种特质只有在单体生命过程中才能得到具象的呈现，反过来，只有解决单体生命过程中消极向度的重大冲突，才有可能切实地矫正宏观文化形态的演变方式和发展趋向，并且转换其本质。

这里之所以说恐惧是中国现代人格的情感标识，就是因为中国近代的悲剧性历史遭遇见之于单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深重最惨痛也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情感层面上的恐惧。历史遭遇既已不可改写，由这种历史遭遇造成的民族劣败地位又长期未获改变。双重重压之下，即时性的个人的恐惧终于凝聚为顽固性的民族情结。这一情结逸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边限。它是历史专门遗留给中国人的额外重荷。只有首先主动担当起这份重荷的中国人，才有望进入从传统到现代的人格跃迁轨道。因着这样的情势，近代以来，中国人按照人格的不同取向，显豁地分化为“阿Q”

① 从汉字字源上看，“狂”字有疯狗或狗疾奔逐物等直接与狗相关的本义和原形。

② 甚至读史的发现和忆及“妹子”夭亡缘由给“狂人”带来的强度疑惧，实际上都早已预算在“我怕得有理”一句中。